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 词源研究史略

◎ 曾昭聪 著

 语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词源研究史略/曾昭聪著.
—北京:语文出版社,2010.4
ISBN 978-7-80184-999-1

I. ①魏… II. ①曾… III. ①汉语—词源学
—研究—魏晋南北朝时代②汉语—词源学—研
究—隋唐时代 IV. ①H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37768号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词源研究史略

曾昭聪 著

*

语文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1号

E-mail: ywp@ywchs.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联华印刷厂印刷

*

890毫米×1240毫米 32开本 7.375印张 212千字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5.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序

我国的词源学史研究一直较为滞后,这不等于我国没有传统的词源学,只是以往词源学史的研究都包括在训诂学史、汉语史之中。如果从所含的词源学研究成果来看,在汉语史的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段中,最为薄弱甚至模糊不清的就是从魏晋至唐五代的中古段。在一般人心目中,东汉刘熙《释名》至宋代“右文”说的几百年间,词源学似乎一片空白;特别接触魏晋至唐代经注,罕见词源探究的成果,更会感到词源学断了线;尔后的“右文”说,则似乎是突然冒出的怪物。毫无疑问,要推进汉语词源研究和词源学的发展,必须研究我国的词源学史;而要研究词源学史,应特别重视中古时期词源学史。

现在,曾昭聪在出版了《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述论》八年之后,又给我们奉献了一本《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词源研究史略》。物稀为贵,先睹为快。

毋庸讳言,现当代的汉语词源(或称语源)研究,有章太炎的《文始》为代表的据汉字系联同源字族的传统词源学派和以高本汉《汉语词族》(张世禄译为《汉语词类》)为发端的构拟古音、据音系联的西方历史语言学派,而长期以来,在学界都是后者占优势。影响所至,似乎科学的词源学来自西方,因而中国的词源学研究也必须“全盘西化”。这种学术风气下,传统词源学除了声转的板块还有被批判继承的价值,其他则似乎属于该扬弃的主观唯心的历

史垃圾,因此传统词源学的研究一直较为冷落;现代学者对魏晋南北朝至唐五代的词源学的研究成果更寥若晨星,在相当长时间内只有张永言的《邨道元语言论拾零》和周祖谟的《徐锴的说文学》两篇。近年才有个别汉语史和词源学的著作从这一时期的一些文献中梳理出词源探究的一些新材料,但据笔者所见,所引用词源探究大小词条不超过200条,涉及文献不过十来种。要研究这个时期的词源学史,决不是据已有材料作理论“提高”所能济事,而必须首先材料“开源”。

但这并非易事。由于古代词源学研究的材料多是零碎分散,因而必须对这一时期的各种文献作广泛的爬梳、调查,不能只驻留于一些熟见的文献;同时还必须认识并掌握古代词源研究表现方式的多样性,不能囿于词的音义关系来源之一隅。本书作者深明于此,充分把握古代词源研究表现方式的多样性,既注视古人对原生词和孳乳词之音义关系来源和词源义的探究,又注意由语素组合而成的复音词构词理据的训释,以此对这一时期的经籍注疏、字书词书、笔记杂札等作深入、全面的排查、审检、发掘,终于抉发、钩稽了丰富的词源探究材料。粗计曾书,其重点取材的文献25种,其中魏何晏《论语集解》、晋嵇含《南方草木状》,唐玄应《众经音义》、慧琳《一切经音义》、孔颖达《五经正义》,唐李匡义《资暇集》以及唐五代刘恂《岭表录异》等16种文献,为迄今的词源学著作很少涉及。各书所以含词源研究词条不等,最少的三国吴陆玕《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14条,最多的颜师古《汉书注》117条,全书所取25种文献共计达889条。从传统词源研究方式看,声训、得名之由、声转、“右文”释义四种类型皆有。其中得名之由,有名物词正名、别名、俗名甚至讹名的得名之由的探讨。诸词条涉及的不仅有单音词,也有复音词、叠音词、联绵词;有汉语词,也有外来词;有书面词,还有口俗词。表现形式,也有明示、暗示、单示、入训语示等等。这使人们眼前一亮:原来这个漫长的中古时期,传统词源学并

不是一片空白,而是存在着、发展着……

作为史论,本书的写法与结构跟常见的综理举证的述论体式不同。全书主体是将从穷尽性梳理、发掘所得千余条(包括有些未列入者)词源探究材料的25种文献,按魏晋至唐五代的先后顺序类聚为九章,最早的是郭璞注,最后的是徐锴的《说文解字系传》;每章分若干节,每节主要内容是分项归纳该文献的词源研究的词条,多数是将该文献的条目全部列入,个别量多的就选列(如《玉篇》有70余条,今列入41条)。继之,以“按”后逐条疏证、评析(极少的条目显豁而不“按”不证);然后设“小结”专节总论该书在词源研究中长短得失与在词源学史上的地位。这相对独立又先后承接词条疏证加小结的九章,加上《前言》、《结语》就构成这部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词源学史。这种“证”多于重于“论”的结构与写法,显然出于两种考虑:一、原先已知的词源探究材料较少,故本书“着力于发掘材料,用材料说话,用事实说话,从语言材料本身归纳各自的业绩”。二、这个时期的词源学材料,无论出于何种文献,基本是词条训诂的形式,许多词条需要抉发、解释即需要疏证才能显其词源探究的用意与特点。因此本书不采取一般史论的体式,乃旨在突出词源研究材料的发掘,此不为过。

但是,决定本书成功与否的,不是发掘词源研究条目的巨大数量,而是对这些条目的疏证与诸多“小结”。这是一项前人未全面、系统做的工作,作者做得认真、到位。总体上,疏证求实有方。对于“右文”释义,抓住源义素,凡是有某个共同源义素的一串词,就是同源词,故离析源义素以证。对于声转词,则围绕声义关系,声则置于该时期的音韵系统明其通否。对于得名之由,则根据名与物的统一性证其源。对于一般的声训,则察其属于右文、假借、声转之何种以证。而无论哪一类的词源条目的疏证,都使用文字、训诂、文献证,而不是单凭语音和义理分析。这些都符合对传统训诂学和词源学的研究方法,因而本书被疏证的大量词源探究条目,

无论是是或非非,大都析解合理,信而有征。在此基础上进行归纳小结和最后的《结语》,是本书的史论部分,能较集中地揭示这个时期词源探究的状貌。例如对得名之由的研究,通过陆玕《疏》从外形、从口味等到《酉阳杂俎》从声音、从典故等的探究,可以见到三十多种方法,从单音词扩展到复音词、连绵词、外来词,表明这个时期这方面的词源研究的发展。从《玉篇》的许多以共同源义素训释同声符词到徐锴《系传》大量利用声符或同声符字揭示词源,则具体显示出“右文”说前的“右文”释义已是训诂常法,“右文”说已含于“不言”之中,从而可以使人认识尔后出现的右文说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此外,我们也从中见到词源理论的片光吉羽。如《南方草木状》、《匡谬正俗》等注意到“语音讹转”与名称之间的联系;《齐民要术》有所谓“以人姓字为名目,亦有观形立目,亦有会义为称”之论;《慧琳音义》中有“从声立名”之说,等等,都反映了古人宝贵的词源学思想,可称为词源理论的萌芽。总之,经过作者的大量疏证和总结,我们见到了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五代的探求词源的广泛性和多样性,从汉代的声训到这个时期更广泛的名物得名之由探究的词源研究的发展新态势。

自然,本书毕竟属于草创,书中有的词条疏证深度不足;以文献分篇按序组合、疏大于论的写法与结构,突出了史料,却使理论部分显得相对薄弱。但瑕不掩瑜,本书不失为第一部在对大量资料作穷尽性研究基础上产生的、考论结合的词源学断代史著,并且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份可供进一步研究、丰富可靠的中古时期词源学史新资料,值得我们展卷一读。

黄金贵

于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原杭州大学)伏雪斋

2009年4月

目 录

序	(1)
前言	(1)
一 汉语词源学史的研究意义	(1)
二 汉语词源学史的研究现状	(2)
三 本书的主要任务	(8)
四 关于词源学史的研究方法	(11)
五 本书的命名	(16)
第一章 郭璞注中的词源探讨	(18)
一 《方言注》中的词源探讨	(18)
二 《尔雅注》中的词源探讨	(38)
三 小结	(46)
第二章 中古三部农学杂著中的词源探讨	(48)
一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的词源探讨	(48)
二 《南方草木状》中的词源探讨	(53)
三 《齐民要术》中的词源探讨	(57)
四 小结	(61)
第三章 《水经注》中有关得名之由的探讨	(63)
一 《水经注》对事物名称来源的探讨	(63)
二 《水经注》关于事物名称改变的探讨	(67)

三 小结	(72)
第四章 原本《玉篇》中的同声符同源字探讨	(73)
一 原本《玉篇》中同声符同源字的系联	(74)
二 原本《玉篇》中关于同源字的其他材料	(81)
三 小结	(83)
第五章 魏晋至唐代经注中的词源探讨	(85)
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注中的词源探讨	(85)
二 唐代经注中的词源探讨	(89)
三 《五经正义》中的词源探讨	(91)
四 小结	(96)
第六章 隋唐笔记中的词源探讨	(98)
一 《颜氏家训》中的词源探讨	(98)
二 《酉阳杂俎》中的词源探讨	(106)
三 《资暇集》中的词源探讨	(119)
四 《岭表录异》中的词源探讨	(127)
五 小结	(135)
第七章 颜师古的词源探讨	(137)
一 《匡谬正俗》中的词源探讨	(137)
二 《汉书注》中的词源探讨	(149)
三 《急就篇注》对得名之由的探讨	(168)
四 小结	(179)
第八章 佛经音义中的词源探讨	(181)
一 《玄应音义》中的词源探讨	(181)
二 《慧琳音义》中的词源探讨	(195)
三 小结	(201)
第九章 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中的词源探讨	(203)
一 《说文解字系传》中的词源探讨举例	(203)
二 《说文解字系传》中词源探讨的成绩	(209)

三	《说文解字系传》中词源探讨的不足	(210)
四	小结	(213)
结语	(214)
一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词源研究的业绩	(214)
二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词源研究的不足	(216)
三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词源研究在词源学史上的地位	(217)
四	研究展望	(219)
主要参考文献	(220)
后记	(226)

前 言

一 汉语词源学史的研究意义

赵振铎先生曾经说到,“汉语的历史记载几千年连绵不断,汉语的研究也有几千年的历史,从来没有停顿。当然,其中也有高下之分,精粗之分,优劣之分。探讨我国语言研究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从中总结规律性的东西,为发展新的语言科学服务,为‘四化’建设服务,为建设两个文明服务,这就是研究中国语言学史的目的。”^①古人对于汉语词源的研究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总结古人研究的得失,为当代汉语研究、汉语词源研究提供借鉴,为词源学在当代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建立提供有力的材料和研究基础,这是汉语词源学史研究的学术目的。

王宁先生指出,“汉语词源学是一门以探求汉语词的原初造词理据和音义状态为目的的学科。词源研究是中国传统训诂学中十分古老的课题,周、秦、两汉‘小学’中的名物问题、声训问题、语转问题,宋代以来的‘右文说’、清代训诂理论中的‘因声求义’问题等等,都与词源有关。”^②可以说,中国传统语言学中已包含了相当丰富的词源研究成果。要讨论当代词源学的发展方向,就必须重

^①赵振铎《中国语言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页。

^②王宁《汉语词源学将在二十一世纪有巨大发展——首届汉语词源学学术研讨会述评》,《汉语词源研究》第一辑,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页。

新审视传统词源学的研究成果。

汉语词源学史的研究是通过对传统词源学史上相关典籍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找出这一时期词源学研究的成果并把它们放在整个中国词源学史上对它们的成绩与不足进行分析,从而发现传统词源学史上更多的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研究词源学史的意义在于:其一,有继承才能有发展,有创造,发展学术事业,加强学科建设。王宁先生曾说,“词源的探求远涉史前语言的状态,近及汉语、汉字的形音义,加上词源意义的潜在特点和汉字多不直接表音的局限,使它的研究需要多学科的支持,因而具有相当的难度,成为训诂学的尖端课题之一。”^①词源学史的研究是我们今天进行词源研究的基础工作和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加强对它的研究意义重大。其二,研究汉语词源学史,发掘古人的优秀研究成果,可以弘扬民族文化,摒弃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提高民族自信心,用具体实在的材料和观点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

二 汉语词源学史的研究现状

关于汉语词源学史研究的现状,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介绍。

(一)代表性论文中的相关研究

关于汉语词源学史研究的单篇论文不少,当代学者中最早注意到这一问题的应当是张永言先生。他在《酈道元语言论拾零》中说到,“他在研究地名的时候就接触到如下三个问题:(1)名称是怎样成立的?(2)名称是怎样改变的?(3)语音和文字是怎样

^①王宁《汉语词源学将在二十一世纪有巨大发展——首届汉语词源学学术研讨会述评》,《汉语词源研究》第一辑,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页。

交互影响的?”并以具体例子对这三类问题进行了讨论。^①该论文于上一世纪的六十年代早期面世,由于起点甚高,曲高和寡,学术界似乎对此重视不够。

周祖谟先生关于汉语词源学史的研究主要见于对《说文系传》的研究,《徐锴的说文学》言简而意赅,对此有比较深刻的阐述。“在考索字义方面,徐氏特别注意的是从声音上去探讨。这也就是清人所说的‘因声以求义’。他所应用的‘因声以求义’的方法有二:一种是从谐声上来看,即谐声字的意义有时可以与其声旁相通,有时可以与其同从一个声旁的谐声字相通。”第二种方法,“是从字音的声韵上来看,用声韵相同的字去说明字义之相类似。”^②虽然对《说文系传》的评价还有可继续讨论之处,但能从声音角度对五代时期的著作加以注意,在词源学史的研究上是很有意义的。

词源学史研究的热潮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形成。关于词源学史的研究论文数量不少,但主要集中于声训、语转、右文说等一些热点问题。

王凤阳先生《汉语词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是一篇长文,其中第一部分“关于词源研究历史的回顾”实际上就是专谈词源学史的;该文将汉语词源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发轫阶段、探索阶段、综合阶段。发轫阶段(先秦到两汉)是义源期,探索阶段(魏晋到清末)是字源期和词源期,综合阶段(鸦片战争以来至今)是词族期。该文注重理论的总结,它认为汉语词源学史“在训诂主导的时期,它体现为义源学,研究者从溯源释词走向词源探索。在音韵学、文字学主导时期,它发展为字源学,研究者通过形声字声符归

^①张永言《郢道元语言论拾零》,《中国语文》1964年第3期。

^②周祖谟《徐锴的说文学》,载《问学集》,中华书局1966年,第843-851页。

纳法去探索意义上的关联。在古音研究主导的时期,词源探索突破形障,进入词源学。在西方词源学的影响下,词源学发展为全面董理汉语词源的词族学”。^①理论的探讨用功甚勤,不过对词源学史的材料运用并未有所超越。

此外,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还有不少,此不赘述。^②

(二)几部有代表性的语言学史著作中的相关论述

到目前为止的几部有代表性的中国语言学史著作中对词源学史有程度不等的研究。

王力先生《中国语言学史》共分四章,即训诂为主的时期,韵书为主的时期,文字、声韵、训诂全面发展的时期,西学东渐的时期。这四章也是他对中国语言学史的分期。书中第一章第五节是“声训”,第二章第十节是“六朝至明代的文字学和训诂学”,第三章第十五节是“训诂学”,其中均有部分内容涉及词源学史,如第五节有对声训和《释名》的评价,第十节有对唐代颜师古《匡谬正俗》的评价,第十五节有对王念孙《广雅疏证》的评价。由于该书形成较早(该书是王力先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大讲义,1981年出版),受时代影响,书中的某些评价不尽可取,如对声训和右文说就以否定性评价为主。例如他说到,“声训对中国后代的语言学既有不良的影响,也有良好的影响。不良的影响的结果成为‘右文说’。这是认为谐声偏旁兼有意义,而上文所举‘缣,兼也’,‘锦,金也’等例已开其端。良好的影响的结果成为王念孙学派的‘就古音以求古义,引伸触类,不限形体。’”^③虽然他于此段话中加注,说“跟声训一样,‘右文说’也不能全盘否定”,但他把右文说说成

^①王凤阳《汉语词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汉语词源研究》第一辑,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8页。

^②曾昭聪《汉语词源研究的现状与展望》(《暨南学报》2003年第4期)一文中已举例谈到一些,请读者参看。

^③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2页。

上古声训“不良的影响的结果”，实际上同时否定了两者。

王力先生对音近义通说是极为赞赏的。他认为音近义通说是右文说的“良好的影响的结果”，“这种重形不重音的观点，控制着一千七百年的中国文字学。直到段玉裁、王念孙，才冲破了这个藩篱。文字既是代表有声语言的，同音的字就有同义的可能：不但同声符、不同意符的字可以同义；甚至意符、声符都不同，只要音同或音近，也还可能是同义的。……这是训诂学上的革命，段、王等人把训诂学推进到崭新的一个历史阶段，他们的贡献是很大的。”^①同在《中国语言学史》一书中，他对右文说严加批评，而对音近义通说极为赞赏，表明了他作为当代语言学家重视语音的进步观点。但是话又得说回来，汉语、汉字有自己的特点，形声字是形音义结合的，乾嘉学者在古音研究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了音近义通的理论，但他们实际上是发展了右文说，段氏注《说文》，王氏疏《广雅》，都吸收了右文说的合理内核，提出某声有某义，并进一步“引申触类，不限形体”。清代乾嘉学者在语言研究上取得了重大成就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并不只孤立地从语音出发，而是兼顾形与音的。

濮之珍先生《中国语言学史》共分六章，分别是：绪论，先秦时期的语言研究，秦汉魏晋时期的语言研究，南北朝至明代的语言研究，清代的语言研究，“五四”运动后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其中有一些内容涉及词源学史。如第二章第二节中谈到“关于名实问题的讨论”，第三节是关于“荀子的语言学思想”的介绍，第三章第五节是“探求汉语语源的专著《释名》”，第五章中有关于“《说文解字》的研究”和“王念孙、王引之的语言研究”的讨论，其中有不少内容跟词源研究是有密切关系的。^②

^①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7页。

^②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何九盈先生《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共分六章,即“先秦的语言研究”、“两汉语言学”、“魏晋南北朝语言学”、“隋唐宋语言学”、“元明语言学”、“清代语言学”。该书关于词源学史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章中设立了一节“汉代词源学”,第六章中设立了一节“清代词源学”。小节标题突出词源学史,这是颇有创见的。^①另外,他在《中国现代语言学史》的第六章“训诂学与辞书编纂”下也设了“词源研究”一节,对章炳麟、刘师培、高本汉、杨树达、沈兼士等人的研究作了述评,说明他比较充分地注意到了词源研究的相关成果。^②

赵振铎先生《中国语言学史》共分六章,即“先秦时期”、“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宋元明时期”、“清代到‘五四’以后”、“‘五四’到八十年代”。该书也有不少地方牵涉到词源学史,并且论述较为详细。如第一章下面的“诸子的语言观”、第二章下面的“声训和刘熙《释名》”。另外在第四章中对右文说也作了比较中肯的评价。^③

由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几部中国语言学史著作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词源学史,其主要内容集中于先秦诸子的语言理论、汉代以《释名》为代表的声训、宋代的右文说、清代的因声求义等。虽然词源学史的轮廓已经出来了,但过于粗略,如果要系统认识汉语词源学史,只注意到这些内容当然远远不够。

(三) 词源学史著作中的研究

关于汉语词源学史的专著,到目前还只有殷寄明先生《中国语源学史》^④,有必要作重点评述。

①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②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③赵振铎《中国语言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④殷寄明《中国语源学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

其一,这是第一部汉语词源学史的通史著作,它为汉语语言学史的研究填补了一项明显的空白。该书除绪论之外共分八章,即:“先秦:语源学诞生”、“两汉:语源学崛起”、“三国至五代:语源学递衍”、“宋代:语源学转向”、“明代:语源学合流”、“清代:语源学鼎盛”、“近代:语源学革新”、“当代:语源学确立”。每一章下面又分若干小节,从古至今,对汉语词源学史进行了梳理。该书认为,汉语词源学的古今演变经历了八个阶段(即上述八章内容),其中汉、宋、清代和当代是四个高峰期;晚近时期是汉语语源学的一个分水岭,此前的词源学为传统词源学,声训、语转说、右文说三大词源学流派从囫囵浑一到陆续分离独立,最后又殊途同归走向合流,是其主要发展脉络,晚近以来的词源学则为科学词源学;当代的词源学已处在学科独立的前夜。可以看出,该书对汉语词源学史有了比较全面而深入的把握。

其二,该书在词源学史的研究中比较注意系统性的研究。作者认为,学术流派体现了对特定学科的研究的根本方法,同一学科的各个流派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的总和即构成了整个学科的发展史;就汉语词源学史而言,近代以前的词源学属于科学前期的、传统的词源学,它的历史就是声训流派、语转说流派、右文说流派从合到分,又从分到合的历史。三个流派观是该书的核心理论。以此为出发点,该书在述及传统的词源研究成绩时就从三方面分别说明。如在第三章下面就分出三节内容:第一节“语转说发扬光大”,谈到了《史记》三家注中的语转说、郭璞注语转理论上的发展和颜师古训诂中的语转说;第二节“声训的沿用与改进”,谈到了李登的《声类》、郭璞注、张揖的《广雅》、李善的《文选注》、颜师古的《汉书注》与《急就篇注》、《史记》三家注等等;第三节“右文说已显露萌芽”,谈到了晋代杨泉《物理论》、崔豹的《古今注》、郭璞注、唐代颜师古注以及五代徐锴的《说文系传》。

不必讳言,该书以 32 万字的篇幅讨论了汉语词源学史从古到

今的整个发展过程,时代很长,篇幅有限,因此,对历史上的词源研究成果评价似过简略;某些重要的成果未能尽录。就笔者浅见,在魏晋至唐五代这一时期还有不少成果可以写进汉语词源学史。

从总体上来说,该书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汉语词源学史的著作,创始之功十分明显,它的重要性将随着汉语词源研究的深入而日益显现。另外,殷寄明先生的《语源学概论》一书中的第二章“语源学源流论(上)”和第三章“语源学源流论(下)”实则谈的就是古代词源学史和现当代词源学史。^①

三 本书的主要任务

通过对汉语词源学史研究的现状进行简要的评论,我们看到,古人的词源研究成果很多,今天的学者也已经注意到了其中的不少成果并且对它们进行了评价,这是词源学史研究的基础和重要成果。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不少的语言学著作或论文中,不少学者在提到词源学史的时候,往往会说,继两汉的词源学高峰之后,又一个高峰便是宋代,其标志即右文说的出现。这中间几百年的时间内,可以称为承前启后的研究成果大家注意到的往往只是晋代杨泉《物理论》中的一句话:“在金石曰坚,在草木曰紧,在人曰贤”。但是,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王宁先生曾指出:

现在有些训诂学史、文字学史、音韵学史,很少亲自去阅读每个时期的学术著作,最多也只是大致看一看那些名著,而不去考察当时的多数学者都在想什么、说什么。在叙述到历史脉络的时候,也往往目不斜视,只关注一条人们经常说的“主线”,对周边的环境很少涉及。这种根据二手材料和一两部名著写学术史的做法,

^①殷寄明《语源学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